班主任怒骂，教师情绪失控不是小问题

观点

据媒体报道，日前，重庆西南大学附属中学班主任徐某某疑似情绪激动，在班级群怒骂“都给老子滚”，相关聊天记录在社交平台传播后，迅速引起舆论关注。不少网友将矛头直指涉事班主任。班主任所在的中学也于近日给出公开回应：目前已经暂停了徐某某的教育教学工作，后续将根据调查情况做进一步处理。

作为老师，还应恪守职业道德

聊天记录显示，班主任徐某某老师在群里称“现在情绪很不稳定”，此后，该老师情绪失控地在群里说“都给老子滚……滚远点……”对此，该中学工作人员表示，现已暂停涉事老师的教育教学工作，后续将根据调查情况进一步处理。

有资料显示，徐某某曾多次获得国家级、校级奖学金，获评“优秀学生”“优秀个人”等称号；在当教师后，多次获得教学比赛一等奖，还参研多项重庆市级、区级基础教育课题。这些优异的履历，说明徐某某的教学能力、业务水平是得到认可的。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一位具备专业教学能力的教师，在工作过程中情绪崩溃？眼下，最重要的是，教育部门及校方需要安抚班主任的情绪，并尽快调查清楚，给予公众一个解释。

虽然这位班主任在家长群里说脏话的直接原因尚不清楚，但作为一名老师，尤其是班主任，不论情绪多么激动，都应恪守职业道德，不该在工作性质的班级群中有极端言行。班主任在很多学生心目中，是其言行举止的示范，如果班主任都缺乏礼貌与素质，对学生也不可能有什么好影响。因此，涉事学校暂停其教学工作合乎情理，当事人引发网友的质疑和批评，也怪不得别人苛责。

教师在班级群发表情绪化言论，肯定是不妥的，这不仅加剧家校矛盾，也损害教师形象，更无助于解决实际问题。因此，教师在处理实际问题时，应该更沉静、妥当，必要时，也可以向学校求助，共同寻求解决办法。

要问责更要关注教师工作压力

实实在在的成绩，相信足以证明徐老师的教学能力、业务水平。那么需要关怀的是，这样一名教学能力强的教师，为何会在工作过程中被逼到情绪失控？有必要追问，她到底是在什么情境下说出这些话，又面临着怎样的工作压力？

“累够了”“受够了”，近年来中小学教师的工作压力大，已经是一个老话题了。在一些地方，除了繁重的教学任务，各种各样的非教育教学任务“包袱”压得一些教师喘不过气，而作为班主任，还得处理不同家长反映的各种琐碎问题。不少班主任都曾吐槽，每天超负荷工作，自己的情绪已在崩溃边缘。豆瓣平台上，一则“当班主任已经在抑郁的边缘，该如何自救”的话题下，来自多地的年轻教师纷纷吐槽又相互打气。在这种情绪状态下，如果再有个别家长提出要解决某一问题，或者向学校举报、投诉班级里有什么问题，都可能成为压倒班主任教师的“最后一根稻草”。

中国人民大学发布于2023年的一项调查研究针对1998年至2022年间中国教师心理健康问题进行了分析，发现过去24年中，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呈现出缓慢上升的趋势，且这种趋势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恶化。研究数据显示，300多万大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为18.7%，而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为17.8%。

在此背景下，班主任徐老师在班级群里情绪失控、发飙，却收获一些网友的同情，也就能理解了。

事实上，对于班主任老师“发飙”，很多家长可能并不会站在班主任角度去理解。拿家长投诉来说，打一个投诉电话很容易，而只要有投诉，不管投诉是否有理有据，教育部门都会责成学校调查、给出处理意见，而为了这一个投诉、举报，班主任往往要花更多精力来处理或解释，而很多所谓的投诉、举报，其实是家长的过度反应。

报道里的一个细节是，徐老师在群里@家长说：“想告就去告。”该家长回应她：“就你这句话，我肯定找学校。”家校关系发展到这一步，也引人深思，实现家校共育显然还需更多着力。

综合自成都商报、中国青年报等

（谚路 整理）

防盗版不应成为高校教材收费的托辞

□ 吴睿鹤

近日，有媒体报道，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童之伟在朋友圈提出，应关注法学教材设置知识点扫码收费现象。其指出，高等教育出版社《宪法学》教材中设置了46个二维码收费点，每个3元共138元，扫码付钱才能解锁新知识。

一本定价47.8元的高校教材，中间设置了46个二维码收费点，每个收费3元，共计138元，收费总额相当于原教材的近3倍。有人笑问“宪法学知识怎么这么贵啊？”

面对舆论的强烈争议，以及网友们的质疑，高等教育出版社该教材编辑作出回应称，“拓展阅读”部分的资源对于新书用户都是免费的，只需输入图书封底处的防伪码即可，设置二维码的初衷是为了防盗版，“一本书只能绑定一个手机号，二手书可能就绑定不了”。目前正在与技术部门联系，协商后期如何完善这方面情况。

出版社言外之意，是基于防盗版的“初心使命”，是对高校教材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并非为收费而收费。对于购买新书而言，扫二维码并不收费，可以轻松实现“阅读自由”；倘若是二手书或盗版读者，要想看到这些内容就必须收费。高校教材编著者付出大量劳动与汗水，这样做，既可以鼓励学生购买正版书、新书，也能间接提高出版社包括作者的经济收益。

这种理由听起来冠冕堂皇，实则经不起仔细推敲。作为育人的重要依据和载体，教材在文明传承发展中具有独特功能与价值，承载着极其重要的育人功能，因而，教材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这也显然意味着，高校教材具有公益性和普惠性，不能利益至上，见钱眼开，不能只顾经济效益，更应当照顾和关注其社会效益。

如今，有不少高校包括中小学校，为了帮学生们节省开支，同时也为了环保，采取教材循环使用的政策。而高校教材，很多学生就用一个学期，考试过后就当废品卖了，下一届学生仍要原价订购，这不仅无形中增加了学生的经济负担，也与教材循环使用的大势趋不合“节拍”，甚至有些格格不入。

尤其是，高校中有数量不少的贫困学生，购买二手教材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这种收费模式，直接将这些群体“拒之门外”。难怪乎，童之伟教授郑重表示：“自己已收到出版社电话说明该情况，但其认为二手书也是别人买的，合法取得，不应限制使用。”

一本教材46个二维码，3元一次的扫码，不仅有悖教材作为特殊文化产品的公益逻辑，也彰显出版社和出版工作者对教材严肃性和重要性的认识偏差。

微信工作群不能成了“影响工作群”

□ 戴先任

日前，青海省海北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州纪委办公室，对2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如祁连县卫生健康局先后建立“卫健系统主要责任通知群”“卫健系统信息报送群”“卫健系统创城群”等18个微信工作群，群内人数最多的达358人，且大多职能重复，并无实际作用和意义，基层干部回复应答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增加基层干部负担。

近年来，“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在多地都较为普遍，比如微信工作群过多过滥；有微信工作群还变成“聊天群”“留痕群”“拍马群”等等。

微信工作群有便捷、互动、无纸化等优势，大大减少了沟通成本，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但微信工作群在一些地方却“变形走样”。

比如有的微信工作群成了一些人秀工作的场所；微信工作群甚至还滋长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用，如一些领导本应到现场检查工作，有了微信群后，就要求下属拍照片发到群里，就算检查了。微信工作群甚至还滋生了各种腐败问题，比如有媒体曝光一些干部在微信工作群索要红包的行为。有的领导在朋友圈、微信群秀爱好，如书法字画、烟酒茶饮等，这让一些下属投其所好，让双方的行受贿行为变得更为便捷。而微信工作群过多过滥，也成了基层干部的“不可承受之重”，让他们不得不浪费大量时间精力来应付微信群里的各种领导指示与讲话，甚至不得不无奈、违心地加入到在微信群里对领导逢迎拍马的队列中。

除了微信工作群，“指尖上的形式主义”表现形式还有不少。比如一些政务微博、政府官网、政府APP等，变成了“僵尸网站”“睡眠网站”等等。

对线上“四风”问题要进行有力整治，对“指尖上”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要进行精准打击。比如对微信工作群过多过滥问题，要能减量，更要提质，让工作群回归本质，有助于提升工作效率，给基层干部减负。不能让微信工作群成了“影响工作群”。

还要认识到，“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根源在“心里”，线上问题根源在“线下”。微信工作群等过多过滥，“低效运行”，成了“指尖上”的负担，暴露的也是线下的“四风”问题。所以，对“指尖”上形式主义的整治不仅要“在线”，还要对“四风”问题进行源头治理，补上制度漏洞，要筑牢线上线下的“反四风防线”，才能防范形式主义问题借信息化手段升级，让“四风”问题无所遁形，从而才有利于提高行政效能，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